

杨鹤龄 反清“四大寇”之一

杨鹤龄（1868～1934）的父亲杨启操，是翠亨村屈指可数的富绅，据说在潮汕一带“卖猪仔”（苦力贸易）而致富，捐纳得“朝议大夫”的官衔，在翠亨村中建有宏伟的大宅，在港澳有很多生意和产业。杨鹤龄自小随家人在港澳，甚少回乡。因此孙中山与杨鹤龄虽是同乡，但却是孙中山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时由同乡兼同学的谭虚谷介绍才熟悉的。

杨鹤龄曾师从岭南大儒简朝亮，又就读于广州算学馆，与尤列为同学，后随家人在香港歌赋街经商，家中开设有“杨耀记”商店。孙中山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时，课余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在“杨耀记”后楼相聚，“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来往密切，非谈革命无以为欢，其中最为仰慕发起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古人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失败，清政府视洪秀全为寇，他们谈论时说，我们的志向，和洪秀全一样，于是便笑称自己为“四大寇”。这期间，陆皓东、郑士良等来往广州、上海经过香港时，也常常在“杨耀记”暂住，与“四大寇”经常聚谈反清言论，因此“杨耀记”商店后来被称为“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

1892年，孙中山向澳门镜湖医院借银开办中西药局，“担保还银人”是杨鹤龄的妹夫、澳门绅商吴节薇。孙中山在澳门受到排挤，转往广州及



1892年前后，孙中山（左二）与杨鹤龄（左一）、陈少白（右二）、尤列（右一）等合影，此四人常相聚抨击时弊，鼓吹勿敬朝廷，被称为“四大寇”。

香山石岐开设药局，但手头拮据，据杨鹤龄之子杨国铨回忆，当时杨鹤龄曾变卖位于澳门龙嵩街的一所房子与吴节薇，所得资金全数赠给孙中山作发展事业之用。

后来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杨鹤龄则在港澳一带协助筹募经费及作反清宣传，一度在陈少白创办的革命报刊《中国日报》中任职。民国成立后，杨鹤龄隐居澳门，并把居所命名为“杨四寇堂”，以纪念这一段革命往事。

1919年5月16日，闲居澳门的杨鹤龄曾致函孙中山，希望为革命效劳，信中说：“自我公乙未举事以来，此身思为公用，望之数十年矣。此数十年中因孙党二字几于无人敢近，忍辱受谤，不知几极。弟又平素不善治生，上下无脚，竟成废弃，深为自惜。今者国家多事之秋，如弟之宗旨不变，诚实可靠，若用做奔走，用做心膂，赵冲国所谓无如老臣者，弟亦云然矣。”孙中山收信后，批复：“函悉，此间现尚无事可办，先生故闭户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

1921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就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



1923年4月，孙中山任命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的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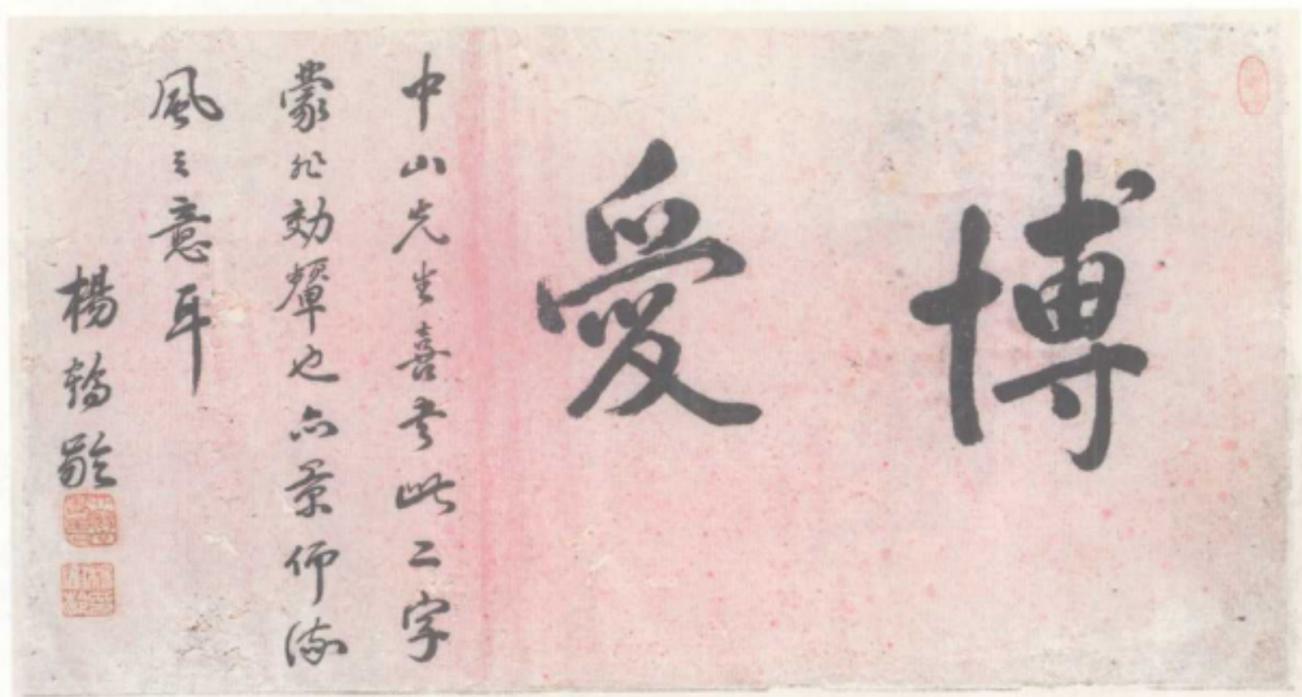
问，并每月馈赠五百元作为养老金；又把越秀山南麓文澜阁修葺一新，延请杨鹤龄、陈少白、尤列三位“四大寇”时期的革命元老居住。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越秀山。孙中山转赴上海，杨鹤龄则回到澳门。

1923年1月9日，杨鹤龄再次致信孙中山，信中说：“近观大局，知己大有转机，广东三千万同胞，日日望公解决，非如前岁之情况矣。老夫睹此，大有雄心，极欲服务民国。……始谋有我，而收效岂无我乎？嗟乎！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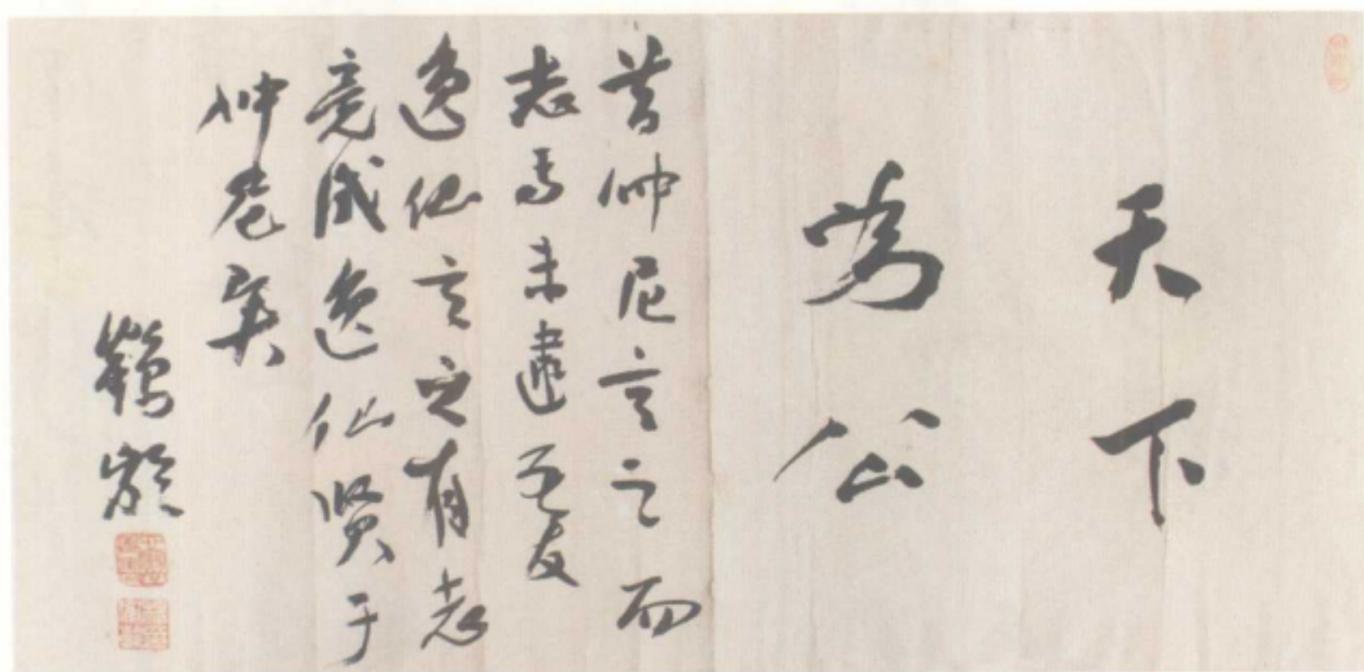
想我公必不便四皓永匿商山，二老长居东海也。”也许是此信的后半段引起孙中山不快，孙中山收信后，批复拒绝了杨鹤龄的请求：“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此又何足为怪。现无事可办，无用于长才。”1923年3



1921年9月，孙中山聘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的聘任状。



杨鹤龄手书“博爱”横幅（林冠群提供）



杨鹤龄手书“天下为公”横幅（林冠群提供）

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于4月4日，任命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杨鹤龄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言论和为人处世，都衷心敬佩，晚年最喜欢书写“天下为公”及“博爱”赠与友人。他在所书的“天下为公”下常常写上“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一段话；而在所书的“博爱”下则常常写上“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顰也，亦景仰流风之意耳”，可见他对孙中山的景仰和钦佩。杨鹤龄性情诙谐，别人问起他的革命事迹时，常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

冬松阅世卧云壑

志强殉元同志序

高木为今似瘿瘤

鹤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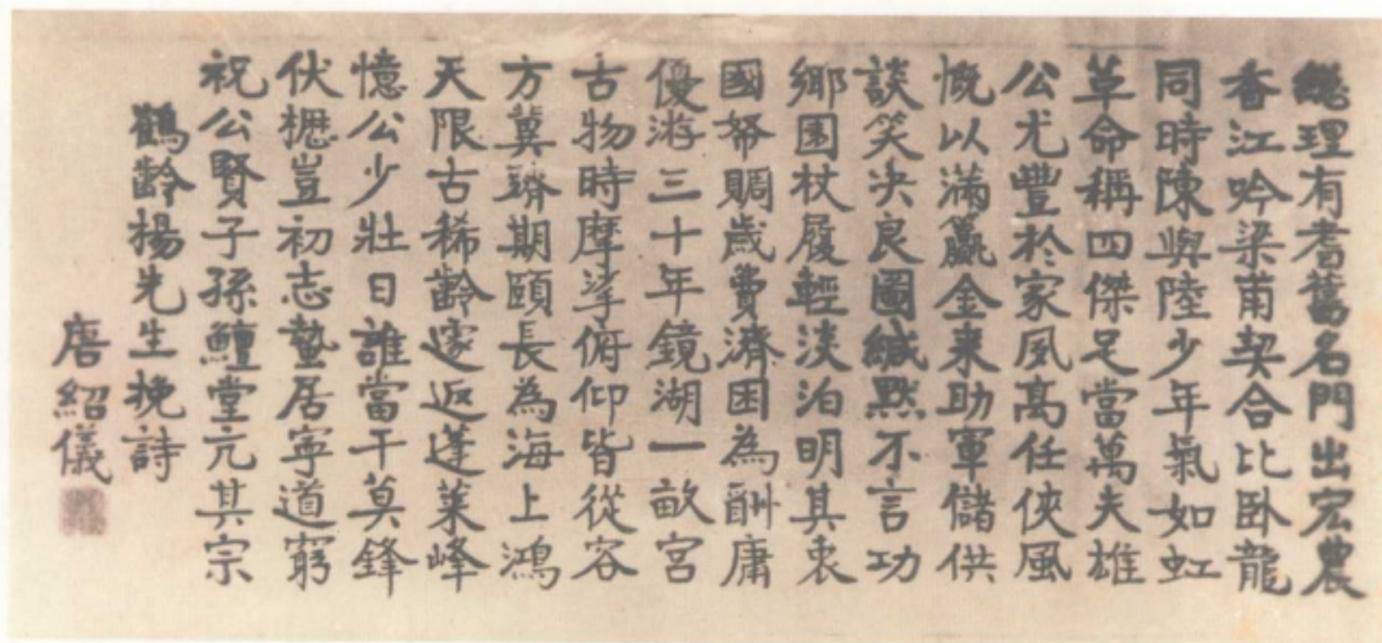
杨鹤龄手书对联墨迹 (林冠群提供)



1932年3月6日，杨鹤龄与容华铃合影（林冠群提供）



位于翠亨村金槟榔山山麓的杨鹤龄墓



杨鹤龄去世后，唐绍仪手书的挽诗手迹。

由婉言谢绝，而对于革命先烈的亲属后裔则时时关顾，现在还保存下来多封他要求为黄咏商、林喜智、程耀臣、谭弼、朱贵全、邱泗、郑弼臣、杨衢云等建墓立碑及抚恤遗族的信函。

晚年蛰居澳门的杨鹤龄，“蒿目河山，曾无片好，中原多故，外侮频仍”，忧国之心日重，时时借酒消愁，举杯轰饮，醉后“时发牢骚之谈，痛斥执政者日非”。

1934年，杨鹤龄在澳门病逝，后安葬于家乡翠亨村金槟榔山麓，墓前遥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墓侧立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的褒卹令，褒扬杨鹤龄“性行高洁，器识宏远，早岁助勦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而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挽诗，中肯地概括了杨鹤龄的一生：

总理有著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
 同时陈与陆，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
 公尤丰于家，夙高任侠风。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
 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围杖履轻，淡泊明其衷。
 国帑凋岁费，济困为酬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
 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翼躋期颐，长为海上鸿。
 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锋。
 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鱣堂亢其宗。